

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反思儒家文化的困境

周春兰

(上海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儒家文化经历了一个由兴盛到陷入困境的过程, 究其陷入困境的原因, 蕴涵在这一文化体系中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传统思维方式中乏于抽象、长于经验的思维倾向, 尚古保守、惯于排异的思维倾向等, 使得儒家文化缺乏一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 与文化固有的开放性、时代性等特点越离越远, 最终陷入自身无力摆脱的困境之中。

【关键词】传统思维方式; 儒家文化; 困境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7)04-0043-04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经历了一个从开创形成到盛行成为主流、再一步步陷入困境的过程。在新文化运动中, 曾经主导了中国社会一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却被批评为封建社会“吃人的礼教”, “孔家店”要被“打倒”。回首这一过程, 令人叹惋和深思, 叹惋深思之余, 我们会发现: 儒家文化陷入困境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历史的必然。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角度来揭示这一历史的必然。

人们的思维总是在一定的方式下进行, 因而人们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 是一个文化体系的特质, “传统思维决定了传统文化”。^{[1] (P18)} 所谓传统思维方式, 就是经过原始选择、正式形成并被普遍接受, 具有相对稳定性, 成为一种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程式和思维定势, 或形成所谓思维惯性, 并由此决定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这种稳定的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和程式, 就是传统思维方式。它是传统文化的母胎。”^{[1] (P18-19)}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特有风貌, 它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 创造了灿烂的儒家文明, 但步入近代, 这种思维的局限性却暴露出来了, 对儒家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的影响。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有: 缺乏抽象、长于经验的思维倾向, 尚古保守、惯于排异的思维倾向, 等等。

与古希腊、罗马重抽象逻辑思维的不同, 中国传统思维特别重视的是经验。以经验为基础, 首先产生出来的思维形式便是直觉。直觉思维是一种非逻辑的思维方式, 它不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来把握和认识事物的内涵与外延的, 而是在特殊的具体的直观领悟中把握事物认识事物的。与直觉思维相联系的是意象思维, 它是从具体形象的符号中把握抽象意义的思维活动。如中国人在认识客观外界的时候, 强调“道”“器”的统一: “道之外无物, 物之外无道”、“器亦道, 道亦器。”^[2] 作为规律、本质性的“道”与作为具体的、个别的事物的“器”之间存在着“体用同源, 显微无间”^[3]的关系。那么在中国人看来, 自然就可以通过“器”来认识“道”, 即由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来把握规律性、本质性的东西。“立象以尽意, ……系辞焉以尽其言。”(《周易·系辞上》)就是说这个意思。这在中国传统概念思维上表现的尤为典型, 中国的贤哲们往往不给对象范畴以明确的内涵, 而是通过描述它的特征或通过上下文加以直观的理解, 使得概念范畴“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有学者就指出, 中国古代人的理论思维方法是从直观体验开始, 跳过以概念元素的分解与综合为特征的抽象思维阶段, 而直接升华为直觉, 达到对人生哲理的顿悟。^{[4] (P37)} 的确, 传统中国人擅长这种直觉性的意会性思维, 如“仁”这个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范畴, 但孔子却从来没有具体规定过“仁”的内涵与外延:

收稿日期 2007-06-20

作者简介 周春兰(1982-)女, 江西赣州人,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文化建设。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子贡问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作者注)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

同一个问题,同样是孔子的学生,孔子的回答却每次回答都不一样,其内涵与外延宽泛多变。不仅如此,有的甚至可以作出两种对立的解释,并且这种对立在后世儒者发挥下可能变得愈加紧张,致使儒家文化在内容上陷入不可调和的困境。如“仁者爱人”与“克己复礼为仁”实际上可以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爱人之仁蕴涵了人道原则和自然、自愿原则的统一,而“克己复礼为仁”蕴涵的则是人为的亲亲和尊尊的宗法、等级原则,两者在孔子思想里并存,集中的表现在孔子之仁具有“爱有差等”的一面。在一个特别重伦常秩序的社会里,“克己复礼”对爱人之仁的人道原则形成了一道阻遏的屏障,因为礼作为制度和规范,是由人订立的,具有非自然性。这样,克己复礼就具有把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自愿原则分离的必然性,如果说这种必然性在孔子那里还只是初见端倪的话,那么在后世儒学中就变成了现实。“人道原则一旦与自然原则、自愿原则相脱离,就有可能变成虚伪的做作和强制性的束缚。所以,正统儒学虽然在某中意义上仍延续着孔子的人道原则,但实际上却孵化出了人道(仁爱)的面具下的假道学和吃人的礼教。”^[5]

如上所述,传统文化的范畴、概念大多缺乏严格的定义,而且还有多义性,每每根据上下文、不同的应用或不同读者的理解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而无须另外创造其他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4](P38)}因此,“意会”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可避免的导致“附会”。所以,当人们在遇到一种新事物、新思想的时候,不是去构建新概念来表述它,而是在储存的概念、范畴中寻找类似的概念来表达。如把洋人归为“夷狄”,反对洋人的入侵,则用“尊夏攘夷”来概括;面对西方近代科学,中国传统概念中没有与之对应的概念,则以熟知的“术数”来代替;连从事国际间的外交事务,在官方文件中也称“筹办夷务”。这样“附会”认知的结果是:在还没有认

清事物的性状、属性之前,就把它们归类于传统的概念、范畴中,使人们永远束缚在陈旧的观念中,也认为新事物没有值得学习之处,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所以,西方的一切新事物都没有必要学习,国粹立场愈加坚定。如,在刘锡鸿看来:“今西洋之俗,以济贫拯难为美举,是即仁之一端,以仗义守信为要图,是即义之一端。”^{[6](P109)}哥特式的大教堂,印报机以七万份每小时的速度风驰电掣的运转,上下议院的政治辩论,化学、光学与电学实验等活生生的先进文明越是有可称道之处,越能增强他们“用夷变夏”、“礼教至上”的信念,认为这一切都是“圣人礼教”传播的结果。

在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眼里,西洋的政俗也是“闻圣教所致”,可见孔孟之教行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性,孔孟之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洋夷不可能不接受孔孟之道这种普遍真理的感化。根据这种“泛教化论”,洋夷自然会被中国的圣人之道所吸引,会被我们的礼乐教化所同化,因此我们不必学习西学,更不必去模仿夷俗和末技。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儒家政治哲学和伦理纲常无须作出任何内部的调整与改组,只需按圣人之学去“反其本”,一切内外交困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反其本”就是“省刑罚,薄税敛,使士者皆欲仕于朝,耕者皆欲耕于野。商贾皆日出于其涂,邻国之民皆仰之于父母。如此者,在孟子时不过朝秦楚、莅中国,在今日则虽统大九州,而为君不难矣。”^[7]这种奇特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国粹信念。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传统儒家文化体系即他们心目中的“圣学”,是“具有超时空的、绝对合理和完美的、自我和谐的有机体系。”^{[4](P155)}如此完美的体系是不需要我们更不需要外邦的补充与变更的,这样,儒家文化就不自觉地成了一个封闭的、排他的体系。然而,开放性是文化固有的特征,文化的发展是在不断的与外界的交流整合中实现的,自我封闭只能导致文化落伍而被抛弃。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正统士大夫作出上述看法和选择的时候,儒家文化就已经一步步向困境中走近了。

二

“一个强调个体性和具体知觉的民族倾向于从过去的惯例和周期性发生的事实中,建立一套基准

法则，即以先例作为先决模式。”^{[81](P127)}“中国人常常重视先例，不强调抽象原则；……信赖仅仅根据抽象思维就得出的诸结论，是及不上信赖过去生活经验的”^{[8](P126-127)}久而久之就产生一种偏重依恋过去事实的思维倾向，所以提出“稽古”。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就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当哀公问政时，他回答说：“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荀子·哀公》）还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这种思维得到贯彻并继续下去，人们自然而然视祖先的典籍有不可挑战的权威，这就进而形成一种循旧性的尚古保守的思维方式，相当于心理学中的“思维定势”。人们对于同一件事，过去怎样看，今天也怎样看，形成一种“引经据典”的思维习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经·卿大夫》）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又“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孔孟之道成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这样一来，人们总是在以往陈旧的框架内展开自己的思维活动，不用进行创新。“太虚一理，形为万物，散为万事，合则治，离则乱，顺（之）则正，悖（之）则邪。……所谓要领者，亦理而已。”^[19]

我们不难发现，历朝历代的士大夫、文人学士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论证方法：引经据典——援引古制或古例。对他们来说，现实的经验与现实的价值目标似乎没有任何说服力，这样一来，祖先的典籍就是不可动摇的权威。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有关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普遍原则不被圣贤发现，经典显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成了能涵盖一切的普遍真理，是全能的。不仅如此，经典还是永恒的，“经”、“典”、“常”体现了真理的永久性，没有任何新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普遍原则需要我们去发现，后人不需要任何创新。这样，原本理性的儒家经典愈来愈被神话，稍有改变就可能被戴上“离经叛道”的帽子。

“通常认为儒学的‘四书’‘五经’等经典限制了中国人的自由思维，但事实上，强调经典权威的保守态度和尚古思想才真正束缚了中国人。”^[81]^(P137)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势必造成人们思想的枯竭、思维老化、自由思想不发达。它使无数的文人士大夫身陷于经学的泥淖中，日夜揣摩着儒家

经典中的奥秘，传统经学那种滚雪球的形式充分散发出了这种泥古的气息。然而，时代性是文化的内在属性，文化的延续与发展需要与时代的发展相结合，需要不断地创新。陷入僵化、故步自封、停滞不前的文化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陷入被批判被抛弃的境地，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要被时代所抛弃。

在尚古的思维倾向的影响下，人们“看待问题”的时候习惯性的以圣人之学为标准，视他说为“异端”并加以排斥，形成一种直线或单向演绎的方法。如前所述，文人士大夫都把“圣人之学”看成是超时空绝对完美的体系，那么它就可以成为当下所有事情是否合理的判断标准，形成一种前者对后者的直线性或单相性的“投射”关系，即“圣学投影”。这样，“圣人之学”就成了获取判断价值尺度的来源和最终依据。董仲舒就是采用这种思维方法先把儒学绝对化，又继而把孔论异化为孔教，最终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纲常名教；宋代以来也是采用这种方式把儒学变为“理学”，然后用僵死的说教束缚着人们的思维，所有不与经典相符的都被看成是“离经叛道”的行为，要加以否定和排斥。久而久之，正统的文人士大夫对什么是旁门左道、异端邪说、妖诞怪语，什么是圣贤世守的大经大法，具有十分发达的分辨神经和能力。根据“圣学”进行“投影”以判断当下时世合理与否的思维习惯，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如西方政教被视为“夷俗”，根据“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孟子·滕文公上》）的圣人学说，则文人士大夫应该把排斥夷狄视为自己的责任。

自儒学的创立者孔子以来，就有视己为正统、排斥“异端”的思想和做法。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排外态度趋于极端，便是反对一切的外来的东西。《战国策》记载赵造反对赵武灵王采纳胡服的理由就是：“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僻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韩愈反对佛学，也是居于这种信条，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论佛骨表》）^{[10](P552)}面对西方文明的到来，传统的士大夫不加分析地把它们归之于夷俗，也要抵制和排斥。铁船洋炮只是

“至拙至愚之器”，一听修铁路便群起而攻之，刘锡鸿还呈交了一份《陈中西情况不同，火车铁路势不可行疏》，该奏疏列举了“势不可行者八，不利者六，有害者九”共二十三理由，极力反对造铁路。^{[4](P57)}以致一些造好的铁路也被拆毁，成为英国妇孺茶余饭后的笑料。即使是洋务派，他们对西学的兴趣也仅仅只在“夷技”上，明末的红衣大炮和清初的佛郎机大炮和当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一样，只是一种来自异域的军事工具而已。如果没有列强的欺凌，中国人是没必要师夷人之技的，因为在圣贤看来，“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所以夷技应该受到拒斥。由此可见，

儒家文化在这样的思维引领下，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外界交流，与文化固有的开放性特征相悖，陷入困境也是不难理解的了。

悠久灿烂的儒家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过光彩夺目的一页，也给人们带来过无限的自豪，但在西方近代文化的挑战下，近代儒家文化的回应却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这是一个古老文化的悲剧，是一个无力摆脱自身困境的古老文化的悲剧。蕴涵在儒家文化体系中的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了儒家文化的走向，近代儒家文化难以实现从传统观念向近代观念的历史转变，观念与现实的严重背离，从而使近代儒家文化陷入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张岱年,成中英等著.中国思维偏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 [2][宋]程明道.语录(卷四)[M].
- [3][宋]朱熹.答汪尚书.
- [4]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5]陈卫平.“仁”和“礼”的紧张[J].载.学术界.1996(2).
- [6][清]刘锡鸿.英轺私记·观电学有感[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7][清]俞樾.国朝柔远记·序[M].台湾学生书局.1985.
- [8][日]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M].世界文化丛书.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 [9][元]徐明善.芳谷集(卷三).读史要略[M].
- [10][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五四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

A Reflection on the Dilemma of the Confucian Culture fro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Way of Thinking

ZHOU Chun - lan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Confucian culture has gone through one process from being prosperous to falling into dilemma. Implication and the reason of studying it to fall into dilemma are the traditional way of thinking in this cultural system. In the traditional way of thinking, the thought trend that lacks 'abstractness' and grows in experience is ancient and conservative, the thought trend fights against the opposite. These make the Confucian culture lack a kind of internal mechanism to self updat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cultural built-in openness, fall into eventually the dilemma that itself is unable to get rid of.

Key words: Traditional Way of Thinking; Confucian Culture; Dilemma

(责任编辑 张俊之)